

早期中俄关系史

(1689—1730)

[法] 葛斯頓·加恩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 028 7517 5

早期中俄关系史

(1689—1730)

[法] 加恩 著

江 载 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61年·北京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by

Gaston Cahe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Sheldon Ridge

Shanghai:

"The National Review" Office

1914

本書原名为《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作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学者葛斯顿·加恩。这部著作主要叙述1689—1730年亦即清朝初叶中俄两国外交和商务关系，介绍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经过。书中引用了许多原始资料。本书系由英译本转译，法文原著的附录也一并译出，可供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者参考。

早期中俄关系史

(1689—1730)

[法]加恩著 江载华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11017·103

1961年8月初版

196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7

开本850×1168¹/₃₂

字数185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9)1.00元

譯者前言

有关早期中俄两国外交关系的历史著作比較少，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加恩的这本著作，是比较詳尽的一本。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次年，英譯者李治就把加恩的这一著作重新加以編排翻譯，登在上海的英文杂志1913至1914年的《国民評論》上面。后来，英譯本和法文原著先后于1939年和1941年在中国出版影印本。我在翻譯这本书时，采用的就是这两种影印本。主要是根据英譯本翻譯的，在发现問題时，参考一下法文原著。北京編譯社的同志把法文原著后面附录的原始文件也翻譯了出来，参考书目則未譯出，如有专门研究的同志，需要查考，只好直接去看法文原著了。譯名对照表是我編的，以便于研究和查考。

这本书的翻譯工作，对于我来说，是力不胜任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知識不够，而可供参考的书籍又不多。书中有不少地方讲到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中亚細亚和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地的民族，以及中俄两国的許多官职名称、地名及人名等等，我尽力作了一些查考工作，然而限于我的水平，其中可能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我曾参考过以下几本书：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云南崇文印书館出版），[清]何秋濤的《朔方备乘》（清光緒畿輔通志局刻本），[清]溫达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清]图理琛的《异域录》的中文本和英譯本等书。就中特别是《朔方备乘》和《异域录》对我的帮助很大。《朔方备乘》是清代出版的一本比較完备和系統地研究中俄早期关系以及清代与西北方各少数民族关系的书，通过这本书及《异域录》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使我能够尽量把当时的地名譯成現在通行的地名，也能够把俄国历次派往中国的使

臣和其他人員的名字按中国史书上的通行的譯法翻譯过来。当然有些地名是不必根据旧譯法来翻譯的。譬如,《异域录》上把“色楞格斯克”譯成“楚庫柏兴”。当时的譯法有些奇怪,往往与俄文的原音大不相符,現在通行的譯法都按原音另譯了(只有像尼布楚等个别地名仍沿用旧譯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再采用旧的譯法,不过知道这种旧譯法仍然很有帮助。至于书中所提及的許多天主教耶穌会神父的姓名和著作,我是查考費賴之(Pfister)編的《早期在华耶穌会教士傳略及其著作題解》(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翻譯的。其中有些专有名詞的譯法,特别是地名还有沒有查考清楚的地方,我姑按原音譯出了,很可能与过去通用譯名有出入。因此,我竭誠希望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和讀者們的指正,我是十分感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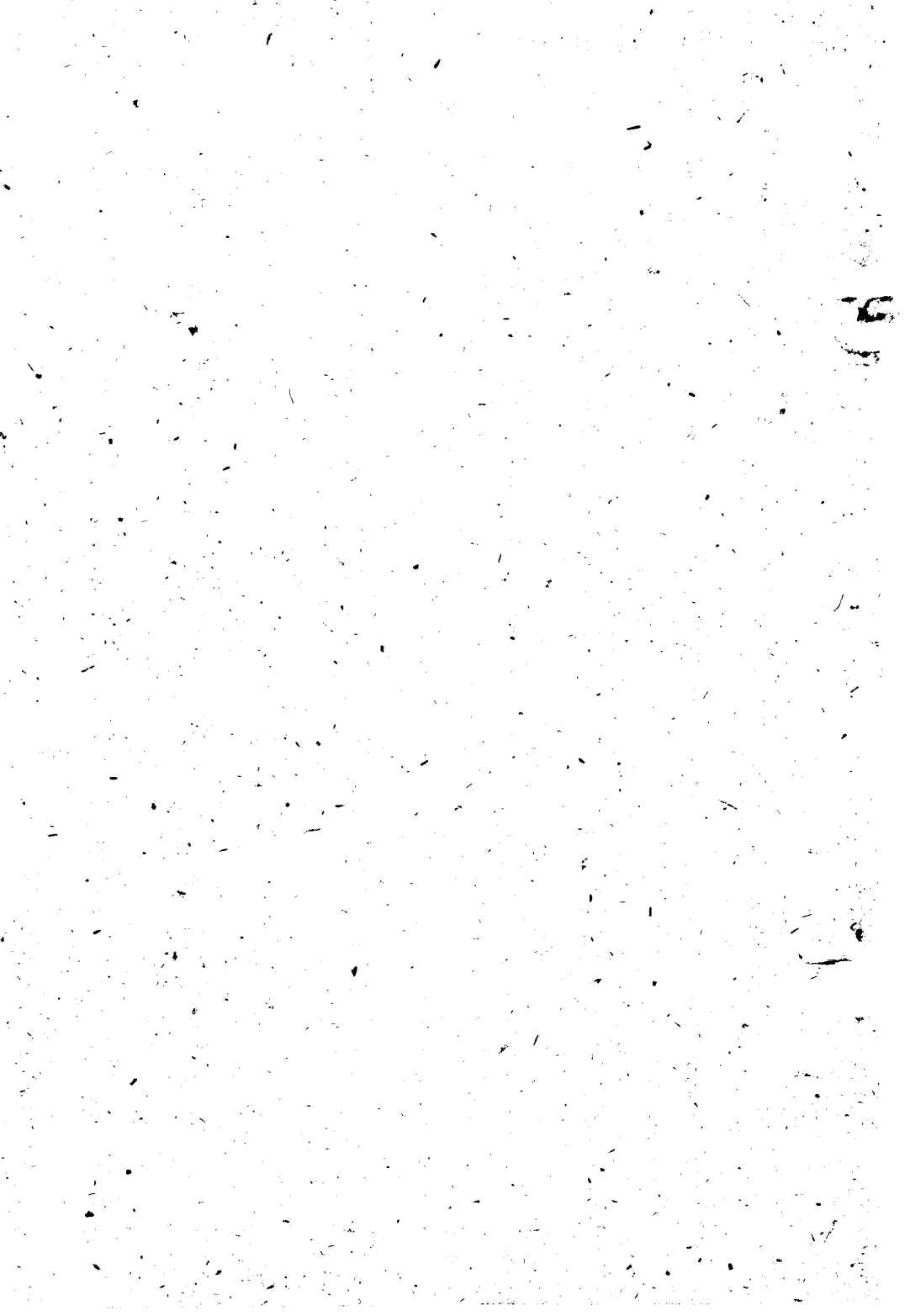
关于本书的作者加恩,只知道他曾在法国远东学校工作过,也曾担任过法国教育部派駐俄国的科学研究人員。除了本书以外,他的著作还有《十八世紀西伯利亚地图》(Les Cartes de la Sibiri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及《1727至1728年俄国在北京商队的賬目表》(Le Livre de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à Pékin en 1727—1728)。至于英譯者,只知道他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會員,除本书外,他的著作有《中国的各省》和《西方来到了东方》,其他情况就不甚清楚。原作者和英譯者都是資產階級學者,他們的观点显然不是正确的,但是本书还提供了一些史料和原始档案,这对于我們研究中外关系史是有用处的。对于这些史料的分析以及对于原作者观点的分析,則有待我国史學界的同志們的努力了。

江 載 华

1961年5月

目 次

英譯者前言.....	3
第一章 十七世紀中俄兩國間的競爭	5
第二章 柯羅文·費要多羅的使華.....	15
第三章 俄國的遠東邊關政策.....	26
第四章 尼布楚條約訂立以後.....	35
第五章 伊茲勃蘭德·義杰斯.....	39
第六章 一六九八至一七一八年間的俄國商隊.....	47
第七章 圖理琛的出使.....	61
第八章 俄國和喀爾木克人.....	72
第九章 伊茲瑪依洛夫的使華.....	83
第十章 郎克在北京.....	93
第十一章 薩瓦·務拉的思拉維赤的出使	102
第十二章 一七二七至一七二八年的商隊: 邊關的改組.....	125
第十三章 宗教關係	136
第十四章 結論	147
附 录	153
譯名對照表	213



英譯者前言

本書系譯自葛斯頓·加恩于1912年出版的著作：《彼得大帝時代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加恩先生的著作，正文写得簡明扼要，但是附有丰富的文件和大量的注釋。这个譯本主要系譯自該書正文，事实上該書的全部正文都已譯出在这里。不过譯者又把加恩注釋中所补充的細节也編入正文，只是在这些补充資料中，取其零星而有趣的列为本書脚注而已。这个譯本的目次虽然依据正文未予更动，但在分章方面并未完全按照原著。

我們應該对加恩先生著作所引用的資料及权威性方面略談几句。他一方面虽也充分利用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权威著作（如本締施-卡明斯基^①、荷尔德^②、司当东^③、郎克^④、貝尔^⑤、美拉^⑥、克拉普罗斯^⑦、阿米奥特及布兰德諸人的著作^⑧，不过他作为主要依据和資料的，却是俄国外交部档案室俄文的原始档案和由圣彼得堡至北京沿途各城市政府的档案。加恩先生对于这些原始資料，都會进行过彻底的研究，因此我們几乎可以說他的著作中的每一句話都是有正式文件为依据的。只有仔細研讀加恩先生这部著作的人，才能稍稍了解他为了从事这部著作的研究曾花費了何等巨大的艰辛劳动和勤勉的考据功夫。

W. 舍尔頓·李治

① 本締施-卡明斯基：《中俄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喀山，1882年版（Бантиш-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ійскими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② 杜·荷尔德:《中国本部和蒙古的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地形详志》,四卷(Du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③ 司当东译:《异域录》,伦敦,1821年版(Staunton, Sir, G. Th.: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713, 1714 and 1715 by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nd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Authority at Peking,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1821)。

④ 郎克:《俄国驻华事务官郎克旅华日记, 1721—1722年》, 1726年法文版(Lang: Journal de la Résidence du Sieur Lange, Agent de Sa Majesté Impériale de la Grande Russie à la Co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21 et 1722, A Leyde, Chez Abraham Kallewier, 1726)。

⑤ 贝尔:《由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 格拉斯哥, 1763年版, 二卷(Bell, John: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2 vols. Glasgow, 1763)。

⑥ 德·马依阿福译:《中国通史, 即中国编年史》, 编译自《通鑑綱目》, 巴黎, 1777—1785年版, 十三卷(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Paris, 1777—1785, 13 vols.)。

⑦ 克拉普罗特:《1806年中俄边界旅行考查记》, 载《亚洲文献汇编》, 圣彼得堡, 1810年德文版(Klaproth(J.): Bemerkungen über die chinesisch-russische Grenze gesammelt auf einer Reise an derselben, im Jahre 1806 in: Archiv für asiatische Literatur, Geschichte und Sprachkunde St.-Petersburg, 1810)。

⑧ 阿米奥(Amiot, Père)的著作载于《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报告汇编》, 十六卷, 北京传教士等传述, 巴黎, 1776—1814年法文版(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6—1814)。

布兰德:《1693—1695年俄国使臣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使华记》, 原文系荷兰文, 1698年英文版(Brand, Adam: A Journal of the Embassy, from Their Majesties John and Peter Alexiewitz, Emperors of Moscovy, etc. Over land into China,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Ustiagha, Siberia, Pauri and the Great Tartary to Peking,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by Eyevard Isbrand, Their Ambassador in the Years 1693—1695. Written by Adam Brand, Secretary of the Embassy)。

第一章 十七世紀中俄兩國間的競爭

根據記載，俄國使節第一次訪問北京，是在 1567 年的兩個哥薩克人：彼特羅甫和雅魯契甫；但是由於他們沒有攜帶“貢品”，因此未獲進謁隆慶皇帝。1619 年宜完匹特靈經過托木斯克到達北京，不過他也因同一理由而遭到和他的先輩同樣的命運。雖然他帶回莫斯科一封中文信，但這封信對誰都沒有用處，因為莫斯科沒有人能讀它。

由十六世紀末葉到十七世紀末葉，俄國派往中國的僅有兩位使臣和兩次官方使團。由 1730 年至 1850 年，派過兩位使臣和三次商隊；但是由 1689 年至 1730 年間，俄國使團出使中國卻不下於四次，而且其中有一次比起其他各次規模巨大；這其間，中國使團還曾出使一次，性質較不重要的俄國官方使團曾出使十二次。因此，探索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的四十年間，為什麼外交和商業來往昇乎尋常的頻繁，並且確定其目的何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十七世紀時，俄國已經由西伯利亞進展到黑龍江流域。在十七世紀中葉，它已經以市鎮或教堂的形式在外貝加爾區建立了居留地。這樣，它就與截然不同於西部和中部西伯利亞游牧民族的鄰邦中國，面對面地相遇了。這一時期兩國間的接觸有武力的也有外交性質的。莫斯科曾兩次派遣使臣到中國來，一次是巴伊闊夫，另一次是尼果賴。有關這兩次出使，我們在這裡略談几句，是不算離題的。

西奧多爾·伊薩凱維奇·巴伊闊夫於 1654 年 2 月 2 日^①接

^① 這裡所指的日期都是俄國舊曆，在十七世紀比公曆晚十天，十八世紀晚十一天，十九世紀晚十二天，二十世紀晚十三天。

到派他出使的正式訓令，致中国皇帝的称作国書的官方文書^①是于同月 11 日交給他的。在这封官方文書中，除了表示希望两国友好往来以外，并无其他明确的要求。但在給巴伊闊夫的訓令中，則命令他一定要当面把这封文書交給中国皇帝，并且还应拒絕一切可能意味着沙皇比中国皇帝地位低微的叩头或匍匐礼。同时，他还应当尽量設法获知进入中国的各条路綫，并应秘密获知中华帝国的軍事实力。巴伊闊夫本身不过是一名外交事务官^②，他又派了阿勃齡先到北京作他自己的先行官。巴伊闊夫自己則取道額尔齐斯河，首先經過甘肃进入中国国境，由甘肃起他就按照大家熟知的道路前往北京。在北京他又遭到以前派往中国的各个外交代表所遭受过的命运和困难，即要求他行三跪九叩礼，并且他必須把文書交給大臣們，而不能亲自交給皇帝。巴伊闊夫拒絕行三跪九叩礼，并且又不肯把文書交給中国的官員。于是，这两件事就使一切都完結了；因此，巴伊闊夫就启程回国，于 1658 年 7 月 19 日到达莫斯科。

派遣尼果賴出使前往中国謁見中国皇帝的訓令是 1675 年 1 月 13 日发出的。交給尼果賴的致中国皇帝的国書的签署日期是 2 月 28 日。在給尼果賴的訓令和国書中都提及俄国曾接到中国的几封来信，但是这些信是用中文写的，而在莫斯科找不到人翻譯，因此无法了解內容。訓令中責成尼果賴仔細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即鄂毕河和額尔齐斯河；劝誘中国派遣使臣，携帶着可以与

① 国書，俄文系 грамотa。——譯者

② 我們在这里有必要仔細分清俄国在这一时期中的外交代表的头銜，最低一级的是外交事务官（即 гофен，相当于英文中的 agent），其次是外交使臣（посланник，相当于英文的 envoy），有时也交給外交使臣以重要的使命，但其地位低于大使（即 соол，相当于英文的 ambassador）。巴伊闊夫、伯夫列夫及阿勃齡是外交事务官，尼果賴是外交使臣。以下我們即将看到，由 1689 年至 1730 年，俄国仅仅派遣过两位大使出使中国，这两位大使都是賦有全权的，并且都和中国訂立了条约。

俄国貨物交換的寶石、金銀以及其他物品前往俄国，或是經常派遣商人前來；并且向中國方面保證沙皇對於中國的純屬和平的意圖。尼果賴於1675年3月4日由莫斯科啟程，並有使節部的兩名官員相隨^①。他在托波爾斯克又補充了扈從人員和貨物，然後取道尼布楚和滿洲到達北京。他受到理藩院侍郎和南懷仁神父的接待。南懷仁神父那時正在北京，他可能是聽尼果賴說由俄國來的道路方便易行，所以後來才向教皇建議，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來可以取道俄國和西伯利亞的。

這個使團也是毫無成就。因為尼果賴雖然獲准謁見皇帝四次（6月5日、6月15日、7月8日和8月25日），但他帶來的國書卻沒有得到答復，他在北京的商務活動也受到了阻礙。這樣，他的使命完全沒有得到預期的成就。中國方面把尼果賴的失敗歸諸下面兩個原因：尼果賴拒絕遵從朝儀，也就是說不肯行三跪九叩禮；此外黑龍江流域那時又發生了相當嚴重的糾紛。當尼果賴離開北京時，南懷仁神父托他轉交給沙皇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南懷仁請求沙皇接受他所著的《分析論說》^②，用來代替一本用拉丁文寫的中文文法；他本來希望送給沙皇一本拉丁文的中文文法，但還沒有能写完。尼果賴按照來時道路歸國，於1678年1月5日到達莫斯科。

介於巴伊闊夫使團和尼果賴使團之間的二十年間，俄國會兩度派遣官方使節前往北京。一次是由伯夫列夫和阿勃齡率領的使團，於1658年3月10日攜帶一封致中國皇帝的信件離開莫斯科，於1662年11月間回到莫斯科。第二次使團只由阿勃齡一人率領，這是1668至1672年間的事。第一次使團所攜帶的信件，以相

① 使節部（俄文系 Посольский приказ，英文系 Secretariat of Embassies）相當於後來的外交部。在彼得大帝改革行政制度以前，俄國共有四十多個部署，工作任務和職能很紊亂，效率亦低，1718年彼得大帝改組政府，成立九個部代替舊時的部署，以後又增加成十二個，各部職責分明。——譯者

② 原文是“Treatise on Anatomy”。——譯者

当长的篇幅陈述俄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意願。伯夫列夫和阿勃龄带回一封中文信,但是由于莫斯科沒有人能翻譯,于是又把这封信交給尼果賴,讓他帶給北京的耶穌会教士去看。除此以外,这两次出使又都是失敗的。事实上,中国人不欢迎这两位使节本人,而且也因为对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持續斗争和激烈冲突感到煩惱。哥薩克人和冒險家在黑龙江岸上建立了雅克薩城,他們的首領之一哈巴罗甫在順河而下时被阻并被迫与中国人作战(1652年3月24日)。斯特帕諾甫在呼瑪爾斯克要塞被困(1655年3月13日),于1658年6月30日为中国人捕获。另外有两件事更使中国人憤怒,一件是一个中国臣民向俄国投誠,另一件是雅克薩城的重建。在1667至1670年間,有一个叫根忒木耳的通古斯酋长带着他的家族和随从人員逃往俄国,而俄国人就給他們施以洗礼,并且拒絕把他們交还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就在雅克薩的俄国人身上报复。这件事的詳情还不清楚,只知道中国人在1683年8月10日曾到那里进行圍攻,并于1685年6月12日取下該城。雅克薩城的保卫者(以亚列克西·托尔布新为首)撤离此城。但在拜頓率領下的新軍又于1685年8月重建新雅克薩;这座城市在1686年的春天已經頗有发展。中国人在7月7日圍攻該城,杀死托尔布新,并且繼續进行有力的圍攻。

不过,中国和俄国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方面对于俄国外交上的提議曾多次去信答复。但是这些信件是沒有用处的,理由很簡單,这些信件有些是从来就沒有送达目的地,要不就是几年以后才送到莫斯科宮廷。不过,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諒解的意願。十七世紀末叶,中俄两国都要求和平。不过,虽然在和平解决两国爭端方面,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两方面所以要求得解决,各自的原因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們在下面應該对它們一一加以分析。

俄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就表示希望与邻邦中国取得更深切的了解。給尼果賴的訓令（比給巴伊闊夫的訓令更为世人所知），表示得很清楚：和平不过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中国以出产金、銀和其他种类的貴重商品著称于世，俄国因此很有理由把中国看作它的将来的巨大市場。西伯利亚盛产毛皮，并且隶属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各民族又都把毛皮作为貢品送到俄国朝廷；用这些毛皮交换中国商品显然会获致厚利。俄国国库由于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和在西方进行的历次战争，十分空虚，急需金銀。只要俄中两国間能够达成一种協議，那末随之而来的两国間的貿易必然不在少数，并且会給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但要想使这种希望不致落空，金銀錠和硬币就必须全部归国家所有。只有国家能够支配商业活动，并使这种商业带来一定的利益。不过，如果毛皮貿易是这样有利可图，那末各种各样的人就都想染指。个人应当把这种权利讓給国家嗎？国家应当允許商人在貴金屬貿易中获利嗎？如果国家干預这项业务，是否会产生毀坏这种业务的危險呢？如果仅由国家来进行俄中貿易，它将以何种方式来管理这项业务呢？国家把这种特权讓出，招人承办是否合适呢？如果这样，該采用何种条件呢？如果这种商业由沙皇个人来壟断并依靠代理人来进行是否合适呢？如果这样作的话，路程如此遙远，同时又因为可能获致巨利而极易进行种种欺詐，應該用何种方式来管理这些代理人呢？俄国政府由于希望在对华貿易中获利，因此冒着与私人冒險家、商业內行以及各种經濟上的勁敌竞争的一切危險，自充官商，从事貿易。

而中国方面，在看待自己与“北方各蛮夷”的关系上，所持观点与俄国完全相反。使中国发生兴趣的是政治关系，并不是商业——商业只不过是私人办理的事务。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在国境四周以朝貢屬国或朝貢部族来确保边境安全；这正是現代

的緩冲国策略的先驅。十七世紀末叶时，介于中俄之間主要有三种民族：在西部，在伏尔加河河口及烏拉尔河流域的是土尔扈特人；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发源地一带的是喀尔木克人和厄魯特人^①；在外貝加尔区的則是蒙古人。土尔扈特人在种族上間接与喀尔木克人有关，最初系定居于准噶尔，后来于十七世紀中叶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十七世紀末叶时，其首領阿玉气汗^②，成为阿斯特拉罕和烏拉尔河之間的各游牧部族的領袖。俄国总想設法使他們对自己发生一种从屬关系；但是这种从屬关系是非常靠不住的，这由連續訂立的几个条約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西伯利亚东部边境上的蒙古人，1686年于基兰·布迟尔地方召开的會議上，由于感到自身太軟弱孤立，于是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連結在一起。可是，由于喀尔木克人向东推进，他們的地位变得更不稳固了。在野心勃勃的酋长們領導下的厄魯特人則是天生的战士，他們居住的地方正控制着由西伯利亚南下以及由中国西行的各条道路，因此他們抱着执整个中亚細亚牛耳的大志。十七世紀末他們降服了不花刺人，并使他們成为自己在外交和商务上的代理人；他們又使自己成为喇嘛教西藏的保护者；以对抗佛教中的黄教或中国支派。在把中俄两国隔开的各个民族中，只有厄魯特部族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力量。

中国是充分了解这一点的。同时，为了使厄魯特人更容易就

① 喀尔木克人源出蒙古族，主要分成三部分：(1)在伏尔加河流域下游草原上，在阿斯特拉罕一带的；(2)在准噶尔、固尔札(伊犁)及中国所屬中亚部分的邻近地区；(3)在柴塔木、青海及西藏北部和蒙古西南地区其他部分的。居住于上述(2)、(3)地区的喀尔木克人称为厄魯特人，他們历史上的主要中心是在准噶尔，十七世紀时他們曾在那里建立过为时很短的一个帝国。1771年在伏尔加河草原地区曾发生有名的喀尔木克人大迁徙，这次共有七万戶人家由俄国迁移到中国領土上来。

② 有的書作“阿玉奇”。——譯者

范，中国着手用全部力量使他們陷于孤立。鉴于蒙古人已經把他們的命运委諸中国了，中国此时所要作的只不过是使他們对中国的从屬关系成为絕对的、永久的和必要的而已。問題是在于，土尔扈特人对于与他們信奉同样宗教的中国人方面的要求，是不是会比蒙古人回答得晚一些。土尔扈特与喀尔木克首領之間的竞争，使得土尔扈特人也置身于反对厄魯特人的行列中。在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間，在游牧的佛教信徒和信正教的俄国人之間，必不可免地缺乏亲切和溫暖，这結果会不会使他們与俄国疏远呢？另一方面，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显然因为各种情况而似乎变得容易完成了；当然也需要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厄魯特人由于既和蒙古人又和土尔扈特人对立，除了由俄国方面外，得不到任何支援。中国因此有必要以一切代价来阻止敌对双方联合起来，因为它們的联合力量将会非常强大，足以破坏势力的均衡并損及中国利益的。厄魯特人由十七世紀末叶起，即以亚洲人的机智，不断地注意着这种联合会产生什么作用，一直在散布着关于这种联合的可能性的謠言，并且也曾暗示过这种联合。但是俄国人对于厄魯特人也不过是和其他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一样看待，它縈迴不已的仅仅是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俄国接待了厄魯特人派来的不花刺人，并在与他們进行交涉时給以优待；而对于喀尔木克人本身，則只要求他們在从屬关系方面作出外交上的保証。

俄国人和厄魯特人的这种关系，当然逃不脫中国的密切注意。中国当然不会因他們之間的敌意而抱憾，而且中国还可能在設法挑起这种敌意。因此，得到中国人友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俄国方面至少應該严守中立。而有关俄国和厄魯特人互派使臣和成立協議之事稍有謠傳，都会立刻使中国人改变他們的友好态度，并且狂怒起来。为了对抗俄国人，中国掌握了一项足以打击敌人弱

点的武器，那就是收回给与俄国的各种商业上的特权。中国在政治上对俄国的不满就会表现为阻挠俄国人进行贸易，愤懑日增，就会造成与俄国经济关系的完全破裂。但是中国人不能同时又与厄鲁特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又与俄国人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因此，中国的策略就是使它的两个敌手彼此为敌。如果我们说俄国所以希望与中国保持和平是为了它的商业，那么中国所以同样希望与俄国达成谅解，就是为了它在中亚细亚的政治关系。

虽然中俄两国确实一致要求达成协议，但是仅仅经过最初几次尝试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中俄两国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借着一个性质较为广泛的条约订立了第一个和约。直到十七世纪末叶，两国才开始彼此有了解。俄国把中国视为半野蛮民族，称中国皇帝为“可汗”，对他的尊称仅是“閣下”而不是“殿下”。而中国则要求对这些“北方的蛮夷”行使宗主权，正如它对其他地方的蛮夷一样。由于彼此都是消息不灵，俄国和中国甚至对于它们本国和对方的领土的幅员都是完全无知的。俄国对于西伯利亚只有一些极不完备和极不精确的草图；而中华帝国连一幅可靠的地图也还没有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除了对于知名而重要市镇的附近地区之外，怎么能划分其他地区的边界呢？中俄两国先后对于本国领土画出信实可靠的地图，那是一件需要相当时日的工作。如果我们说中俄两个帝国被迫不得不从事精确的地形测量是外交为科学服务；那么，两国为求正确地了解对方的要求以及画出一条公平的边界线而获得的不断增长的知識，未尝不是科学帮助了外交。

彼此了解的第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具备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的能力。但是，在十七世纪末叶，俄国人既不懂满文，也不懂汉文；同时中国人也一点不懂俄文。因此，这时的问题是，在中俄官方通信和进行外交商谈时应采用哪种语文？中国人是很熟悉蒙文的，而